



陈蓓丽◎著

结构、文化 和能动性：

上海外来女工抗逆力研究 ——基于生活史的一种解读

结构、文化和能动性： 上海外来女工抗逆力研究

——基于生活史的一种解读

陈蓓丽 著

 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结构、文化和能动性：上海外来女工抗逆力研究：
基于生活史的一种解读 / 陈蓓丽著. — 上海：华东理
工大学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 - 7 - 5628 - 5826 - 3

I . ①结… II . ①陈… III . ①女职工—生活史—研究
—上海 IV . ①D442.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3042 号

内 容 提 要

伴随着经济改革的社会转型，我们见证了中国“劳动力大军”的大迁移，形成了一个规模甚大的“外来女工”劳动力移民群体。带着“外来女工如何应对城市的生活与工作中的困境”这样的问题，本书探索了作为过程的“外来女工的抗逆力”是如何展现的。

本书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关注外来女工的人生体验，并通过对 28 人的深度访谈，获取了第一手研究资料，然后整合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格尔茨的“文化”概念，在结构、文化与能动性的互动之中把握外来女工抗逆力的动态过程。本书在理论上挑战了现有的基于心理学和个体主义的抗逆力理论，提出了一个整合结构、文化与能动性的、关系主义的、动态的抗逆力架构，这一架构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现有抗逆力理论的不足，也为研究外来女工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域。

策划编辑 / 刘 军

责任编辑 / 刘 军 章斯纯

装帧设计 / 戚亮轩

出版发行 /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 200237

电话：021 - 64250306

网址：www.ecustpress.cn

邮箱：zongbianban@ecustpress.cn

印 刷 /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 17.5

字 数 / 226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4 月第 1 次

定 价 / 98.00 元

序

《结构、文化和能动性：上海外来女工抗逆力研究——基于生活史的一种解读》一书是陈蓓丽博士在其论文基础上经精心修改而成的作品。通过深度访谈 28 位外来女工，陈博士不仅取得了翔实的一手资料，并基于外来女工生活史的个案呈现和质性资料的主题与类别分析，提出了一个整合结构、文化与能动性的、关系主义的、动态的抗逆力架构。

尽管抗逆力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现有的抗逆力研究多从心理学的角度入手，过分强调量化，缺乏对社会文化脉络和个体能动性的充分关注。即便是量化研究，现有的研究成果在抗逆力的测量上也没有形成共识。因此陈蓓丽博士的研究转换了视角，不去关注抗逆力的高低，也不再聚焦于谁具有抗逆力，而是试图回答抗逆力是如何展现的。

她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抗逆力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是不断展开的，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结果，所谓的结果只不过是生活中的某个片段的掠影，而生活是不断展开的行动流，抗逆力也呈现为流动的、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来女工不断尝试突破结构的限制，利用文化资源去重新定义情景、形成意义、寻求支持，从而回应生活困境。当然，这样的突破在某种程度上是情景式的，并不能全然突破结构的制约。第二，研究把“结构”视为个体在日常接触过程中反复涉及的规则与资源，而抗逆力则被视为外来女工在逆境中产生的与环境的互动行动流的反思性监

控过程，且此过程是在“反思性监控”影响下对“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即涉及规则与资源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如此，“结构”形成于抗逆力过程，又对抗逆力过程构成制约性与使动性。同时，从外来女工抗逆力的保护层面与风险层面展开论述，可以得出二元性制度的排斥、车间与宿舍的规训、生活体验的痛楚等三方面构成了她们的结构性障碍的结论，树立生活信心、确立期望目标、寻求社会支持表现为个体的能动性与结构的互动而展现出的抗逆力动态过程的构成部分。第三，文化在此被视为一系列互动流所生产的意义与符号系统，而“抗逆力”则体现为外来女工如何把握行动，从而在行动流中得以展现的过程。从对“家”“关系”“忍”三个文化符号的解释与再解释中可以看到外来女工抗逆力的文化之维，而其中也带有外来女工的能动性展现。

针对外来女工抗逆力的动态研究成果，陈蓓丽也提出了社会工作领域如何有效介入外来女工面临逆境时的抗逆力的设想。

陈蓓丽博士是一位勤奋踏实的青年学者，她对社会的关怀也充分体现在这部著作中。作为其博士生导师，我期待她能继续努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精彩的作品问世。

华东理工大学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院长
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ASSW)执委兼国家代表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
现代公益组织研究评估中心(粤·沪)理事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永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001
第一节 研究缘起	001
第二节 研究价值	006
第三节 研究创新与难点	007
第四节 结构安排	009
第二章 文献综述	011
第一节 外来女工研究回顾	011
第二节 抗逆力研究现状	018
第三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026
第一节 概念界定	026
第二节 研究框架	031
第三节 研究设计	036
第四章 抗逆力的动态“呈现”：外来女工小梅的生活史个案	040
第一节 外出打工的动因：备受束缚的生活	040
第二节 外出务工之路	042
第三节 恋爱与婚姻：经历波折重重的婚恋	048
第四节 逆境与成长：脱胎换骨的小梅	052

第五节 小梅生活史之反思	055
第五章 抗逆力：结构中的能动	059
第一节 抗逆力：结构抑或意义？	059
第二节 资源制约性	070
第三节 资源使动性	085
第六章 抗逆力：文化中的行动	099
第一节 抗逆力的文化解释	099
第二节 抗逆力：符号、意义与文化	104
第七章 结构、文化与能动性的糅合：抗逆力的整合性解释	123
第一节 结构、文化、能动性与抗逆力的再讨论	124
第二节 一种结构、文化与抗逆力的整合性解释	131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142
第一节 研究结论	142
第二节 讨论	149
参考文献	154
附录 1 外来女工抗逆力访谈提纲	169
附录 2 主要被访谈人名单	172
附录 3 访谈记录	175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我觉得自己第一年出来打工的时候,就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鬼,在人群中穿梭,怎么就这么飘呢。……除了家庭我什么都没有,亲人就是我现在的唯一。……其实怎么说呢?(打工)给我带来很多体验,人经历的事情多了,就会看清楚世界。我觉得我现在看社会比以前清晰很多,不会那么模糊,不会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很多事情就这样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事情在进行,大家都一样。我经历过很多事情,经历过可以承受还有不可以承受的事情,哪怕到谷底,我也可以再一步步往上爬。

——M1

刚开始找工作的时侯,我觉得很害怕,有一种被锁起来的感觉,这种感觉在老家不会有。……不规律的上班时间让我无法睡熟,睡

不着，我就乱想。我感觉那种痛苦说出来也没用，就习惯性地藏在心里，然后就一直躺在床上，但不会睡着，睡不着。有一天在流水线上，我突然感觉特别难受，就有意无意地摆弄流水线上的工具刀，突然见血了，我突然感到很舒服，有一种压力被释放的感觉，身体的痛减轻了心里的痛。……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没有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我最难过的时候，就想在空旷的地方大喊出来，但是却说不出什么来。这么多年，我觉得自己被封起来了，就好像是一个隐形人。……我觉得越懂事的人，活得越累。我知道以后结婚了，我可能还得为爸妈弟妹做很多事情，我现在都开始担心老公家会对我不满意。我想逃离这个世界，想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知道我不会逃，这算是对命运的默认。

——M16

这两段文字来自两位女孩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描述，也是她们的真实“心声”。在中国，她们是规模甚大的外来女工群体的小小“缩影”，她们在城市的生活和工作中经历着种种逆境。她们如何应对逆境？在应对过程中，她们是否有成长？这些问题促使笔者产生了对该群体的关注和思考。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城乡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形态随之发生巨变。在此过程中，由农村向城市、由内地向沿海、由中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口流动，形成了一个规模甚大的在工厂就业的劳动力迁移群体，而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则是女性劳动力移民数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本书暂且将该女性群体简称为“外来女工”，该群体的规模可透过下列有关数据加以明晰地了解。根据李若建的数据估计，从 1982 年到 2000 年，我国外来女工的数量从 2 953 万人上升到 3 723 万人。^①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 年）数据显示，我国居住地与户口登

^① 李若建：“女工：一个重生的社会阶层”，载《社会学研究》2004 年第 4 期。

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 26 139 万人,其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 22 143 万人,同 2000 年人口普查相比,增加 10 036 万人,增长 82.89%。^①由此可见,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 2.21 亿。由于男女性别比接近 1:1,以此可估算,截至 2010 年,我国女性流动人口数量已达 1.1 亿。现以上海为例来关注一下“外来女工”群体的动态变化。2010 年,长三角三省一市(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的流入人口总量达 4 521 万人,其中上海市 898 万人。^②而上海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信息显示,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为 897.70 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 39.00%,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 年)的 346.49 万人相比,10 年间共增加 551.21 万人,增长 159.08%,平均每年增加 55.12 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 9.99%。依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中的男女性别比例(52%:48%)估算,2010 年,上海市女性外来人口的人数达到 431 万人。^③

上述“外来女工”群体的相关数据展现了客观现实上的数量面貌,那么,通过进一步地了解有关外来女工的研究现状,则可以关注她们身后更为复杂的“群体景象”。国内有关女性农民工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并已从不同角度对她们加以聚焦。谭深探索了打工妹关注的内部话题及其与更大的社会脉络的关联;潘毅聚焦于打工妹的抗争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次文体;杰华则对外来女工经验的主观感受方面给予了特殊的关注,注重女工对自己的遭遇和她们的所作所为所赋予的意义;陈佩华明确指出外来女工构建了某种“生存的文化”,这显示她们的生存境遇不佳;刘林平和郭志坚考察了外来女工的权益保障与企业、政府之间的关系,并认

^①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 页。

^②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76 页。

^③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 页。

为企业、政府和外来女工形成了一个结合体；李若建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对广州外来女工的现状与再生产机制进行了探索。

此外，现有的研究还关注外来女工在当下社会结构下遭遇的一系列困境，诸如社会支持网络断裂、社会福利制度缺失、劳动力市场的失效、社会性别歧视的多重打击、处于社会的“弱势”与底层而生活满意度不高等。城市外来女工的工资收入普遍较低，远低于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和价格，也远低于男性外来人口的工资，因而不足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刘旗、张冬平在河南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得出如下结论：从总体上看，男性劳动力年均纯收入高出女性 56.9%。^①“外来女工权益保障和生存状况”课题组于 2001 年 7 月至 2002 年 1 月对广东地区（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外来女工进行的调查研究表明，城市外来女工的正常月工资只有 683.69 元。^②谭深通过调查表明，城市外来女工的就业空间小，在农民工可能进入的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三大行业中，容量最大的建筑业主要吸收男性，而女性“好找”的，都是那些不需要技术、工作时间长、低工资的工作。^③因此，正如扈海丽对苏南地区外来女工的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城市外来女工就业选择面很窄，多半只能受雇于城里人、当地人不愿干的苦、脏、累活，如缫丝工、纺织工、服装加工、一次性医疗注射器装配、塑料制品加工等。^④谢启文对城市外来女工就业岗位的调查也显示，外来女工在城市主要从事的是“拾漏补遗”的职业。相比较于男性，女性更容易成为非正规就业者。^⑤

① 刘旗、张冬平：“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性别特征及差异分析——以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例”，载《农业经济问题》2005 年第 5 期。

② 外来女工权益保障和生存状况课题组：“外来女工权益保障与生存状况调查报告”，载《妇女研究论丛》2003 年第 z1 期。

③ 谭深：“打工妹的内部话题——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百余封书信的分析”，载《社会学研究》1998 年第 6 期。

④ 扈海丽：“苏南地区外来女性劳动力状况调查”，载《妇女研究论丛》1997 年第 4 期。

⑤ 谢启文：“阳光边缘处的另样生存——北京青年流动农民的生存状态”，载《青年研究》2007 年第 5 期。

“外来女工权益保障和生存状况”课题组通过询问被访者“最近半年您是否有过下列(心理或精神方面的)情况”来了解外来女工的精神健康状况。结果表明,女工在精神健康方面遇到比较多的问题是“觉得身心疲惫”“睡不着觉”“烦躁易怒”和“感到孤独”。^① 郑家学在对外来女工的生存状况调查中得出结论:外来女工劳动时间长,工资低,工作和生活条件差,她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实在堪忧。中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在珠江三角洲对外来女工进行的调查也表明,打工妹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面对许多陌生人,交往困难和思乡之情很容易让人产生孤独感,心理上处于亚健康状态。^② 何雪松、黄富强和曾守锤的研究指出,基于 BSI 量表,475 名移民中 25% 的男性和 6% 的女性可以被视为精神健康不佳,性别之间的差异很显著,但女性的精神健康状况好于男性。^③

尽管目前的研究是以对“困难”“压迫”的“负面”叙事为主,但这样的叙事难以解释外来女工为什么持续进入这个劳动体系,并且有些女工过上了她们期待的生活。于是,笔者对下述一些问题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外来女工作为中国社会“劳动力迁移大军”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她们在城市的生活与工作过程中,面临并经历着前文所述的一系列困境时,如何看待这些困难?她们如何针对这些逆境做出回应,以及做出回应后结果如何?她们如何基于自身拥有的资源和能力进行积极的和有效的应对?还有她们从应对逆境的体验中是否获得成长?而这一连串的问题,都可以集中于对外来女工抗逆力的考察之中。于是,本书将研究焦点置于外来女工的抗逆力过程的探讨与分析。

尽管抗逆力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现有的研究

^① 外来女工权益保障和生存状况课题组:“外来女工权益保障与生存状况调查报告”,载《妇女研究论丛》2003 年第 z1 期。

^② 郑家学:“女工保护调查——一份沉重的答卷”,载《现代职业安全》2007 年第 3 期。

^③ 何雪松、黄富强、曾守锤:“城乡迁移与精神健康: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10 年第 1 期。

大多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入手，过分强调量化，缺乏对社会文化脉络和个体的能动性的充分关注。即便是量化研究，在抗逆力的测量上也没有形成共识。

本书将转换以往的研究视角，试图回答抗逆力是如何展现的，而不是去关注抗逆力的高低，也不聚焦于谁具有抗逆力。因此本书将抗逆力视为一个动态过程，这个过程是在结构、文化与能动性的交互作用之中展开的。

第二节 研究价值

本书希望通过对外来女工抗逆力的研究，体现以下的价值：

首先，本书将进一步补充及丰富劳动力迁移者研究的理论形态。外来女工作为劳动力迁移者群体的一部分，迄今为止，从抗逆力视野对该群体加以解读与关注的研究尚少。并且，抗逆力作为近年来刚刚兴起的一种理论视野，其理论本身有待更多经验层面上的研究来丰富与完善。本书对于外来女工群体的抗逆力经验研究正是希望在这方面做出尝试和探索，希望为外来女工的研究提出新的概念架构。

其次，本书将提出一个有关外来女工的新的叙事方式，以推进对外来女工更为全面和平衡的认识。目前，国内外关于外来女工的研究多数集中于描述她们的困境、生活环境以及工作状况等，对于外来女工在生活与工作之中展现的抗逆力的考察甚少。此外，在社会学理论层面上，现有研究缺乏一个明确的理论框架来审视外来女工的抗逆力。

再次，本书更新了国内外来女工经验研究的知识积累，拓展了外来女工研究的视野。本书基于抗逆力视角，从描述个体的各种困难（如经济困难）和各种对其健康的负面影响，拓展到发现个体用来处理逆境中的问题和获得自我成长的个人和环境方面的各种资源。当然，与此同时，这也为

外来女工经验研究提供了知识积累的部分内容。

此外,本书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是,本书通过对外来女工“日常生活”的倾听,勾勒出她们的生活、工作及交往互动的全貌图景,并透视她们对逆境的适应机制和应对机制,了解她们“自己”真正的需要和困惑。不可否认,现在的一部分针对外来务工者,包括外来女工的研究常常将她们当作“他者”。例如,谭深研究员曾列举的面向打工妹的培训之中,就存在很多内容是学者和培训者认为女工很需要,但是实际上女工觉得用处不大的。而有些外来女工特别需要的信息,却因为调查的某些环节出了问题而被屏蔽^①,或者被忽视。因而,如何听到外来女工自己的声音,也是笔者在研究过程中碰到的困扰之一。另一个困惑是,笔者如何能在整个调查和分析的过程让外来女工真实地描述自己的工作、生活状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方面的尝试有助于定位外来女工在个人、家庭、朋辈和社会层面的真正需要。

二是,本书可以基于研究发现提出一系列有利于外来女工的政策建议和服务模式,能够回应外来女工的特殊需求并提升她们的福利。关于外来女工日常体验的研究发现,将有利于发掘她们自身具备的优势,提出若干改善外来女工工作、生活方面的困境的政策建议和干预模式,这对于为这一特定人群提供社会服务和促进城市和谐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第三节 研究创新与难点

除上述研究价值外,本书也有些许创新之处,同时也存在部分研究的

^① 笔者在某一家工厂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就碰到了这样的情况。在回收问卷的过程中,笔者发现问卷的最后一页有异常,经过细问才了解,因为厂方担心资料外泄后会有违反劳动法的风险,所以连夜把所有的问卷的最后一页改掉,重新装订。

难点。本书的创新之处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本书尝试基于结构—文化—能动性的整合性理论框架来透视外来女工抗逆力的动态过程，丰富了国内有关外来女工的研究视野。而且，基于整合性框架来透视她们抗逆力的过程是一种更具有“社会性”的崭新理论视角，是对抗逆力理论的发展，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意义。其次，本书以抗逆力过程为中心，彰显“结构—文化—能动性”的关联图式，并基于该整合性解释框架，超越了唯“结构”或唯“文化”的理论视野，全方面聚焦于个体行动者之行动本身，并以个体能动性为焦点，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抗逆力理论研究。再次，本书将外来女工的抗逆力与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关联起来，并置于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中加以考察，以更全貌和更宏观的视野审视她们的抗逆力。

当然，本书也遭遇了几方面的研究难点。一是，本书所提的结构—文化—能动性的整合性解释框架，是在质性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考察，该解释框架尚存不够完善之处，仍需进一步完善与提升。并且，结构—文化—能动性的整合性解释框架仍存在诸多理论上的争议，且尚不存在较为成熟的讨论与检验，本书仅仅对此做出一种理论建构的尝试。而有关该整合性解释框架理论的进一步检验与讨论，作者寄望于后续研究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对此进行验证，以更好地检验该整合性解释框架的理论解释力。

二是，本书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外来女工的生活实践和抗逆力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从结构—文化—能动性的整合性解释框架以解读她们抗逆力的过程机制与影响因素。虽然本书力图科学地将质性研究方法运用于研究过程中，但由于质性研究方法本身存在局限性，这限制了本书中生活史个案及深度访谈等实证资料对外来女工抗逆力的解读，也造成了该整合性框架在解释范畴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然而有关外来女工抗逆力研究的解释范畴的扩展，只能依赖于中国外来女工的抗逆力

方面的定量测量方法的完善及应用。这对本书的研究而言,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个难点。

第四节 结构安排

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本书的研究缘起、研究价值、创新点和难点以及章节安排。

第二章,主要回顾了关于外来女工和抗逆力研究的相关文献,并进行了梳理与讨论。

第三章,提出了本书的研究思路与研究设计,并对抗逆力、结构、文化和能动性的概念做出了界定。

第四章,基于外来女工小梅生活经历的呈现,从一个详实的和具象的“生活史”的角度,来展现外来女工在城市中生活与工作的体验,并从中发现了“抗逆力的过程”。

第五章,从社会结构维度切入对外来女工抗逆力的解读。通过对结构理论中有关结构与意义的观念演变的梳理,提出基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来审视外来女工的抗逆力。同时,从外来女工抗逆力的保护层面与风险层面展开阐述,提出二元性制度的排斥、车间与宿舍的规训、生活体验的痛楚三方面构成了她们的结构性障碍,树立生活信心、确立期望目标、寻求社会支持则表现为个体的能动性与结构的互动而展现出的抗逆力动态过程的构成部分。

第六章,从文化维度切入对外来女工抗逆力的解读。文化在此被视为一系列互动流所生产的意义与符号系统,而“抗逆力”则体现为外来女工如何把握行动,从而在行动流中得以展现的过程。从该章节对“家”“关系”“忍”三个文化符号的解释与再解释可以看到外来女工抗逆力的文化

之维，同时也可以看到外来女工的能动性展现。

第七章，借助于对结构、文化、能动性及抗逆力之间的关系再讨论，提出了“结构—文化—能动性”的整合性解释架构。在此整合性解释框架中，抗逆力被视为结构、文化、能动性三者持续互动之结果，并且个体能动性在“结构”与“文化”两个面向上对抗逆力产生影响。换言之，抗逆力是个体在面对逆境时受结构、文化和能动性三者共同作用而形成的行动流。

第八章，是本书的结论部分，在对研究的主要结论进一步提炼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拓展。